

在场主义文学研究·周闻道主持

杨文丰生态散文的在场书写研究

薛平 龙其林

摘要：杨文丰的生态散文创作把科学视角与诗性象征的融合作为核心特征，在理性认知与审美表达的范畴内建立起张力结构，凸显出深刻的伦理担当，体现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在在场主义视角下的重大突破。凭借对“生态体”概念的创新引入、“三态平衡”的充分考量以及“新敬畏”伦理的倡明，杨文丰将生态关怀推进到文明批判与精神重建的高度。三个维度互相支撑、彼此强化，使其散文不仅实现了在场主义“去蔽、敞亮、本真”的美学诉求，也为中国生态文学贡献了具有启示意义的创作样式。

关键词：杨文丰；生态散文；在场写作；科学视角；诗性象征；伦理担当

21世纪以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与生态危机的日益凸显，中国生态散文创作呈现出空前的繁盛态势。在这一热潮中，杨文丰以其深厚的农业气象学专业背景与自觉的文体建构意识，走出了一条科学理性与诗性表达深度融合的独特道路。从早期《自然笔记》系列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诠释与诗意捕捉，到《雾霾批判书》《海殇后的沉思》等作品对重大生态危机的辛辣批判与社会介入，再到《榕树寓言》《夕阳笼罩的珊瑚——自然笔记》《人鱼》等文章将生态关怀提升至生命哲学与文明反思的层面，杨文丰的散文创作完成了从“直觉式自然写作”到“直觉式生态写作”^①的时代转型，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介入性，与在场主义散文理论的核心主张高度契合。

作为一种重要的散文理论思潮，在场主义把“去蔽、敞亮、本真”作为其美学使命，强调散文应具备“精神性、介入性、当下性、发现性、

自由性”^②，要求作家“面向事物本身”，以“身体的在场”与“精神的在场”双重姿态，积极介入当下现实，揭示被遮蔽的真相，“在追求文学呈现诗意栖居中，不要忘记时代的担当和责任”^③。这一理论的核心主张与生态散文的内在精神有着天然的亲和性——生态书写所追求的直面生态真相、介入现实危机、探寻存在本真，与在场主义的美学诉求高度一致。以在场主义理论为框架审视杨文丰的散文，不仅能清晰勾勒其科学、诗性与伦理融合的写作机制，更能揭示其如何通过文学实践在科学实证与诗性沉思

① 程相占、杨文丰：《走进生态审美的“文学现场”——与生态散文作家杨文丰对话》，《粤海风》2025年第3期。

② 叶从容：《在场主义散文的理论渊源及其发展和影响》，《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

③ 周闻道：《在场主义与中国现代散文的转型》，《东吴学术》2017年第1期。

间建立平衡。杨文丰的散文超越了传统生态文学的感怀式表达,成为一种具身化、批判性与建设性并存的在场实践。

一、科学视角： 生态在场书写的理性之维

在场主义散文理论以其“去蔽、敞亮、本真”的美学追求,为文学介入现实提供了一套行动纲领。所谓“在场”,即“面向事物本身”,强调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这意味着散文写作绝非对现实的远观或情绪的独白,而是作家以其全部的“精神性”与“发现性”,穿透现象的重重迷雾,直抵存在真相的勇毅行动。对于生态书写而言,这一“介入”的首要与必由之路,便是科学视角。杨文丰的生态散文,正是凭借其深厚的自然科学功底(尤其是农业气象学背景),将科学视角内化为一种独特的书写规则与思维范式。这不仅为他的生态关怀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事实根基,更使其哲学思辨获得了坚实的逻辑起点,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在场书写的介入力量与真理品格。

在场主义的核心行动是“去蔽”。周闻道指出:“在场主义的在场,就是去蔽、敞亮、本真;在场散文就是无遮蔽的散文,敞亮的散文,本真的散文。”^①在生态语境中,“蔽”往往体现为两种形态:一是源于蒙昧与想象的原始神秘化叙事,二是消费时代被利益驱动所精心构造的符号化幻象。杨文丰散文中的科学视角,首先便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施行着这种文化病理学的解剖与清理工作,实现着对生态现实的深度“介入”。

这种“去蔽”首先体现为对传统自然认知中神秘主义与模糊性的理性澄清。在《佛光》一文中,杨文丰面对那被誉为祥瑞之兆、笼罩着浓厚宗教色彩的“佛光”现象,并未止步于审美感叹或玄想。他以气象学家的严谨,将其还原为一个纯粹的大气光学现象,指出“所谓‘佛光’,实乃人在特定的天气和地理环境下看到的一种大气光学现象——七彩光环……阳光能够打上云雾或雨滴,才能对阳光产生色散作用,将阳光分解成七种色光,继而向人和太阳方向散开或

汇聚而进入你的眼帘,从而使你能看到红光圈在外、紫光圈在里”,并最终形成的一种奇观,他更进一步点明,这一奇观的呈现高度依赖观察者所处的位置与光线角度,“是观测者自身的影子”投射在云雾幕布上所成的像。^②这一番科学阐释,将“佛光”从虚无缥缈的神性象征地位上请下,安放回它作为自然物理现象的真实位置。这不是对美感的剥夺,而是一次彻底的“祛魅”。通过科学之光的照射,自然现象得以从虚幻的象征体系中解脱出来,显露出其客观、可解的“物自体”面貌。读者由此被迫放弃廉价的迷信与附会,转而直面一个遵循物理定律的、更纯粹的自然奇观本身。这正是“面向事物本身”的在场姿态——不回避、不神化,而是致力于廓清认知的迷雾。

更具批判锋芒的“去蔽”,则指向被现代商业文化与消费主义所建构和扭曲的自然幻象。名贵中药材“冬虫夏草”被塑造为兼具动植物神秘属性、能起死回生的滋补圣品,其光环在市场和传说中不断放大。杨文丰在《冬虫夏草》一文中,以冷静得近乎残酷的笔调,对此实施了彻底的解构。他揭示虫草的本质是蝙蝠蛾的幼虫被虫草菌(一种真菌)寄生后形成的“僵尸”复合体。这一科学事实的披露,无异于一次对商业神话和文化盲信的正面爆破。它所“去”之“蔽”,是资本为追逐暴利而编织的华丽谎言,是大众在健康焦虑下对自然物的非理性崇拜。杨文丰以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将“虫草”从滋补神坛拉回它作为特殊生物寄生关系的本质。这种“去蔽”的力量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让读者看清商品光环背后的自然真相;另一方面,它必然引导读者进一步反思这一“祛魅”之后更为严峻的现实——对虫草的非理性追捧所引发的对青藏高原草场生态的掠夺性破坏。在此,科学视角不仅完成了对具体物象的文化批判,更撬动了整套扭曲的生产、消费与生态观念并对之发出了整体性质疑,充分体现了在场写作“介

① 周闻道:《在场主义与中国现代散文的转型》,《东吴学术》2017年第1期。

② 杨文丰:《佛光》,《病盆景》,第110-111页,北京:西苑出版社,2017。

人”现实的批判力度与当下关怀。

然而,杨文丰的科学视角并未止步于冷峻的“祛魅”与解构。在场主义的“去蔽”并非目的,其指向是“敞亮”——即存在意义的澄明显现。如果说传统的“魅”源于无知,那么杨文丰则致力于在理性的最深处发掘出一种更为震撼、更为恒久的“魅”,这是一种基于真知、通向哲思的“复魅”。他的科学书写,在剥离了虚妄的外壳后,转而照亮自然内在秩序的深邃、精妙与和谐,从而在更高维度上实现了对世界的“敞亮”。这种“敞亮”,不是简单的感性赞美,而是认知飞跃后获得的精神豁亮与审美升华。

这种由科学引领的“敞亮”,首先表现为对自然规律本身所蕴含的极致美感与艺术智慧的揭示。在《蝴蝶为什么这样美》中,杨文丰并未满足于描绘蝴蝶翅膀上纷繁的色彩与图案。他深入到鳞片的微观结构,解释其色彩源自“物理结构色”——通过微观结构对光线的干涉、衍射所产生的、无需色素参与的、纯粹而变幻的色泽。然而,他的笔锋并未停留在光学原理。他将这种美提升到艺术哲学的高度:“蝴蝶的华贵美是以抽象为底色的……还有便是秩序。而秩序从来就是高等、高雅、贵重的艺术要素。”^①在这里,科学知识成为一座桥梁,一端连接着客观的物理机制,另一端通往深刻的美学评判与生命感悟。科学视角“敞亮”的,是超越个体感官的、作为一种宇宙法则体现的“美之本质”。这种美,因其根植于必然的物理规律而显得更为坚实、更具神性。

从更深层次上看,杨文丰的科学视角常常成为其“格物致知”、展开哲学思辨的起点,从而实现精神层面的宏大“敞亮”。他善于通过具体的科学观察,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智慧与存在哲理。在代表作《榕树寓言》中,他将榕树庞大根系系统的科学描述,转化为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虚”与“实”辩证关系的生动演绎:“如果说榕树的地面根、地下根,刚劲无比,颇具儒家风骨,那么,气生根飘逸空虚、自在柔弱,则大有道家风范。”^②他领悟到“欲成大道,虚实相生,因虚而实,先虚后实”^③的生命与艺术至理。在这里,科学对自然物性的精准把握(“格物”),为哲学思辨(“致知”)提供了坚实可靠、

无可辩驳的物质基础与逻辑起点。经由科学,读者被引领到一个关于生命韧性、存在智慧与文明精神的敞亮境界。这种“敞亮”,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精神性”与“发现性”,使得散文不再局限在对生态议题的讨论上,而拓展为对普遍存在意义的探求。凭借理性分析,杨文丰生态散文完成了从“祛魅”到“复魅”的辩证跨越,通过揭示自然规律的深邃、精妙与和谐,为自然重新赋予了一种基于理性认知的、更为恢宏的诗意与神秘感。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复魅”。

对生态散文来说,在场主义所探求的“本真”,在于揭示并倡导回归一种健康、可持续、合乎自然规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杨文丰科学视角的终极意义,恰恰为其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中的“本真”生态关系搭建了坚实的思想框架。科学赋予他的不只是对局部问题的洞察,更是一种全局式、系统化、动态性的思维方式,使他能够超越人类中心视角的偏狭,做到对“生命共同体”本真状态的完整理解与执着呼吁。出于这一考量,杨文丰创造性地化用了“生态体”概念。在《榕树寓言》中,他将独木成林的榕树及其维系的所有生命和周边环境视为一个“互相影响、制约且趋向相对动态平衡的独特生态体”^④。这是生态学系统论思想的文学化与哲学化表达,强调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的普遍联系、相互依存与动态平衡,任何局部的扰动都可能引发系统的连锁反应。杨文丰将这一概念从特定的榕树群落,推至整个地球家园,倡导一种超物种、民族与国家界限的“地球村意识”,将整个生物圈理解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巨型“生态体”。就某种意义而言,这正是利奥波德“土地伦理”思想的东方化创见。基于科学视角下的系统观与联系观,他指出,人类的活动不应再被看作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深度介入并扰动整个地球“生态体”平衡的关键变量。

基于这种科学整体观,杨文丰的生态批判才显得这般深刻而急切,直指生态关系的“本

① 杨文丰:《蝴蝶为什么这样美》,《蝴蝶为什么这样美》,第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②③④ 杨文丰:《榕树寓言》,《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5年第1期。

真”重建。在《夕阳笼罩的珊瑚——自然笔记》中,他描绘了因海水酸化而导致珊瑚大规模白化死亡的全球性生态灾难。他的担忧并非出于感伤,而是建立在确凿的海洋化学与气候学知识之上的论断:“任何‘小共生’,唯有和谐入地球村的‘整体共生’,方能和美共生,美美与共,各美其美,万物兴旺。”^①这背后的科学逻辑链是清晰可见的,人类碳排放直接导致海水pH值下降(酸化),引发珊瑚共生藻死亡和珊瑚白化死亡,最终使得整个珊瑚礁生态系统崩溃。同样的在场立场在《雾霾批判书》这篇具有强烈现实介入性的作品中也得以贯彻。文中,杨文丰用气象学知识剖析了雾霾的成因,让人们看到“逆温层”如何像一个“巨大的锅盖”笼罩城市,导致污染物无法扩散;并揭示了人们对雾与霾的认识误区,“霾里雾中都含水汽,但霾的相对湿度是低于80%;一旦相对湿度高于95%,尽管无声无息,却已‘宫廷生变’,霾转变成了雾——齷齪的雾,甚至是毒雾”^②。这种科学的剖析,使得批判不再是空泛的指责,而是对一场“准化学事件”的精确诊断,其带来的震撼与紧迫感,远非一般的文学描述所能比拟。科学视角在此充当了最权威的“在场”见证,杨文丰所倡导的伦理,如“新敬畏”,就不再是道德律令,而是生态系统运行法则的必然要求,是人类维持“生态体”本真健康状态必须承担的责任。但是要注意,杨文丰生态散文对“真”的执守,不仅是科学上的内在需求,更是生态审美的呼吁,“生态散文的审美基于求真,基于对自然、社会的本质、规律和特征的认识,所以,审美能力的提高,有赖于求真能力的提高”^③。他的散文担当,也因此摆脱了空洞说教的嫌疑,成为一种饱含理性洞察力与建设性远见的“本真”呼唤。

二、诗性象征： 生态在场书写的审美之维

科学视角奠定了杨文丰生态散文坚实的理性框架与求真面向,而诗性的象征则赋予其审美光晕,是使其“在场”精神得以审美实现的核心艺术机制。在场主义所追求的“敞亮”与“本真”,绝非止步于事实的罗列与逻辑的推演,

而是“直接呈现在面前的事物,就是‘面向事物本身’,就是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④。“面向事物本身”并达至“敞开”,不仅需要理性的协作,更需审美的加持——需要将“事物本身”从其物理存在的有限中解放出来,升华为一个能容纳复杂意义、激发深层共鸣的审美符号。也即说,在场书写要求的“介入”性还指向心灵层面,而诗性象征正是实现这种深度“心灵介入”的绝佳路径。杨文丰深谙此道,他并未让作品停留在科学的冷静陈述上,而是凭借其深厚的文学素养,精心搭筑了一套深邃、宏大且根植于科学真实的诗性象征体系。

诗性象征,在科学视角的基础之上,承担着更为积极的“敞亮”功能——即让被科学厘清后的“事物本身”所蕴含的复杂生态关系、生命哲理与文明困境,得以艺术地、鲜明地“呈现”出来,照亮读者的感知与心智。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⑤,认为人通过符号创造文化。作为最高级的符号形式之一,象征能以具体的、有限的形象暗示或呈现抽象的、无限的精神意蕴。杨文丰散文中的诗性象征,正是这样一种强大的意义“转换器”与“放大器”,它将被科学视角“去蔽”后显露的自然本真进行审美编码,从而使其内在意义得到前所未有的“敞亮”。

这种“敞亮”首先体现在,象征极大地拓展了文本的意义空间与思想容量。由此,一个自然物,在杨文丰笔下,便成为一个意义场域的焦点。例如《榕树寓言》中的“榕树”,远不止是一种植物学描述对象。它被赞誉为“植物世界的龙,绿色巨龙”,是“伟岸、力量、智慧”的总体象

① 杨文丰:《夕阳笼罩的珊瑚——自然笔记》,《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3年第2期。

② 杨文丰:《雾霾批判书》,《病盆景》,第53页,北京:西苑出版社,2017。

③ 程相占、杨文丰:《走进生态审美的“文学现场”——与生态散文作家杨文丰对话》,《粤海风》2025年第3期。

④ 周闻道:《在场精神的流变及其当下意义——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在场”》,《东吴学术》2018年第3期。

⑤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甘阳译,第5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

征。^①榕树独木成林、盘根错节的形态,象征着生命的繁盛、系统的复杂与生态社区的共生共荣;气生根的飘逸“虚”与支柱根的坚挺“实”,巧妙地与中国道家哲学中“虚实相生”的宇宙法则与生命智慧相呼应;而对自然存在的“绞杀现象”,杨文丰则毫不避讳地揭示了生态系统中竞争、更替的残酷一面,形成了生态伦理思考中难以绕过的悖论与张力。同样,在《蝴蝶为什么这样美》中,蝴蝶也不仅是昆虫,其从蛹到蝶的蜕变过程,也隐喻着生命的超越性与精神的永恒性。在《鉴赏年轮是残忍的事》中,年轮成为时间的化石,生命的档案,命运的密码,镌刻着自然的风雨与历史的沧桑。这些自然物经过作家象征化的处理,脱离了孤立的实体状态,成为通往更广阔意义宇宙的“入口”或“窗口”。它们共同编织成庞大的象征网络,让散文能够言说单一物象本身无法言说的复杂、抽象甚至矛盾的存在体验。这恰是杨文丰散文“思想量”实现艺术化承载、“精神性”得以充分呈现的关键路径,完美回应了在场主义对散文“发现性”与“自由性”的追求。

杨文丰对象征的建构,严格遵循基于自然性、超越自然性的美学原则,这使得其散文“敞亮”的意义具有无可置疑的“在地性”与说服力,避免了凌空蹈虚。他极为尊重物象的客观“自然性”,也就是物象固有的科学属性。这种象征,是从自然性中生长出来的,而非强行嫁接的。在《人鱼》一文中,他将金鱼塑造为“病态美”与“人类意志扭曲”的象征,文中所有充当象征载体的特征,如“雍容华贵”却行动不便的体态、“如梦似幻”却妨碍视力的水泡等,本就是其生物变异的事实。^②有了这份科学的“真”作为坚实基座,其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病态审美观及文化阉割行为的象征层面的批判,才显得如此犀利、精准、令人信服。《夕阳笼罩的珊瑚——自然笔记》中,他将白化的珊瑚礁形容为“反生命的、内敛一条条死亡微生灵”的“珊瑚堡”。^③这个触目惊心的象征,直接来源于酸化现象导致珊瑚体内共生藻离去或死亡仅剩苍白钙质骨骼的科学事实。可以看到,在杨文丰的生态散文中,一方面,科学认知确保了象征的“真理性”,另一方面,诗性升华则赋予了科学事实以直击

灵魂的“震撼力”。这种“格物致象”的写法,正如他在对话中所言,“‘文学形象’基于自然性,自然性离不开物象”^④。他的象征世界始终与大地、与现实、与“事物本身”保持着血肉联系,实现了科学之真与艺术之美的同构,也让被“敞亮”的意义牢牢锚定在存在的坚实大地上。

此外,在场主义的“介入”,不仅是主题和精神的,也必然是语言的。“散文的介入,归根到底是语言的介入”^⑤——这就决定了在场主义书写必然要从语言层面实现散文介入力的穿透性。而杨文丰的诗性象征之所以能产生强大的审美效能,与其极具张力、色彩与韵律感的诗性语言密不可分。杨文丰的散文语言常常冲破常规束缚,充满新奇的联想、磅礴的气势与精准的变形,对读者的感知系统实施“陌生化”冲击,表现出强烈的“介入”姿态。《榕树寓言》的开篇,他大开大阖地写道:“榕树是与南方的金太阳、与热风雨水结伴的树,是绿叶升舔白云的树,是你要以《立在地球边上放号》那般的大肺活量颂唱的树……”^⑥“升舔”一词,化静为动,赋予植物生长一种张扬着欲望与灵性的动态特质,视觉冲击力极强;而援引郭沫若诗歌的意象,与诗名一起,瞬间将榕树的形象与洪荒、浩大的宇宙能量关联起来,为其象征意义奠定了崇高、悲壮的基调。写蝴蝶时,他将科学观察(结构色)与文化典故(梁祝化蝶)、哲学玄思(庄周梦蝶)熔于一炉,让蝴蝶的象征意义在多重维度上累加,进而充满阐释的弹性。他的语言节奏同样富有变化,时而如《榕树寓言》中刻画气生根那般舒缓、飘逸,充满道家般的空灵格调;时而又如《雾霾批判书》中那般急促、陡峭,带着批判的锋芒与控诉的力度,生成了一种内在的情感与思想节律,拉动读者的心绪随之跌宕起伏。这种

①⑥ 杨文丰:《榕树寓言》,《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5年第1期。

② 杨文丰:《人鱼》,《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4年第1期。

③ 杨文丰:《夕阳笼罩下的珊瑚——自然笔记》,《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3年第2期。

④ 程相占、杨文丰:《走进生态审美的“文学现场”——与生态散文作家杨文丰对话》,《粤海风》2025年第3期。

⑤ 周闻道:《在场精神的流变及其当下意义——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在场”》,《东吴学术》2018年第3期。

饱含诗性的语言,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绝不只是描述象征的工具,其自身便是象征的一部分,直接参与并强化了文本的审美力度与情感“介入”性。它迫使读者放慢阅读速度,在拉长的感受过程中,更深切地体味象征所承载的生态之痛与存在之思。

最终,在场主义所追求的“本真”境界,在审美维度上体现为对存在真理的诗意揭示与共鸣,并要求“思”与“诗”的高度统一。海德格尔在《走向语言之途》中提出,“一切凝神之思就是诗,而一切诗就是思”^①,并倡导一种“诗意的栖居”,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②。杨文丰的生态散文,正是这种“思即诗”理念的鲜活体现。他从未将深刻的哲学思辨与审美表现割裂开来,而是让两者充分融合,共同抵达生态存在的“本真”。《榕树寓言》的结尾,作者面对榕树的“绞杀现象”陷入沉思。他没有给出一个简单化的道德判决,而是将其置于自然法则与人类社会的复杂语境中,引导读者进行辩证思考。这种“思”,因其附着在“榕树”这个强大多义的象征物象上,而变得可感、可触、可辩,不再是空泛的哲学教条。生态的复杂性、生存的悖论,通过“绞杀”这个具体意象,形成了直抵人心的生态图景。同样,在《离家的猫头鹰——自然笔记》中,他对自由、囚养与自然伦理的全部思索,都不着痕迹地融入对一只被短暂收养后又于深夜悄然离去的猫头鹰的细致描摹与深情叙事中。当“我”在清晨,望着阳台外那“辽阔高远的天空”,顿觉“所有的鸟事都空了”,并领悟到“彼此自在,各自独立,均感自由,各美其美,才算真正臻入和美”时,^③抽象的生态哲学已然与那一刻的空灵、释然、怅惘等复杂情感紧密糅合。“思”化作成了“诗”的精神,“诗”成了“思”的身体。

这种思与诗的融合,使得杨文丰的散文能够超越对具体生态问题的探讨,跃升至对生命状态、存在方式乃至文明模式的“本真”叩问。在《夕阳笼罩的珊瑚——自然笔记》中,他对珊瑚白化这一科学事实的哀恸,最终升华为对“科技神”崇拜下人类沦为“科技与欲望的‘双重奴仆’”、成为“异化人”的尖锐批判,并呼唤向“生态人”的转型。^④这一思想旅程,始终伴随

着对珊瑚礁瑰丽往昔的诗意追忆与对眼前“死亡城堡”的凄美描绘,哲思的冷峻与诗情的热烈交织在一起,共同照亮了“何以为人”“何以栖居”这一根本性的“本真”问题。另一篇著名散文《病盆景》也直面人类整体的生命状态,它接续龚自珍《病梅馆记》的批判脉络,将整个地球隐喻为“巨型病盆景”,批判的是人类对整个自然的异化,指向对文明整体的生态反思。这样一套“格物致象”的象征方法论,从科学认知出发,经由诗性升华,最终抵达哲学思辨。

杨文丰通过构建根植于科学真实的宏大象征体系、运用充满“陌生化”效力的诗性语言,达成了“思”与“诗”的深度融合,成功为其生态散文开拓了宽广而深邃的审美空间。正是凭借科学视角与诗性象征两大策略的协同推进,杨文丰的生态散文才得以真正实现在场主义所倡导的从“去蔽”到“敞亮”直至“本真”的完整美学历程,在智性认知与审美体验的双重震撼中,完成对读者生态意识与生命觉悟的深刻“介入”与唤醒。

三、伦理担当： 生态在场书写的价值归宿

杨文丰生态散文最终锚定的,是一个深沉而炽热的伦理世界。科学视角构建了其理性骨骼,诗性象征赋予了其审美肌体,而伦理担当则灌注了其散文世界的灵魂与良知,成为统摄全局的精神主线与价值旨归,使杨文丰的写作彻底跳脱了纯文学或纯科普的范畴,升华为一种具有强烈现实介入意识与文明批判深度的精神探索。从这个维度来说,杨文丰的生态书写天

① [德]马丁·海德格尔:《走向语言之途》,孙周兴编选:《海德格尔选集》,第114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② [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王庆节主编:《海德格尔文集 林中路》,孙周兴译,第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③ 杨文丰:《离家的猫头鹰——自然笔记》,《黄河文学》2023年第1期。

④ 杨文丰:《夕阳笼罩下的珊瑚——自然笔记》,《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3年第2期。

然具有在场主义精神内核,因为在场主义散文理论自其诞生便与“担当”血脉相连。它将“精神性、介入性、当下性”置于核心,明确主张散文应“关怀民族的、人民的苦难或最关心的问题”,要求作家以“去蔽”之笔,“敞亮”被遮蔽的生存真相,最终实现存在的“本真”,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在场”,周闻道指出,这是文学担当意识走向成熟与科学的标志。^①杨文丰的生态散文,凭借融科学之真与诗性之美于一体的独特笔触,将生态关怀推进到伦理批判、价值重建与文明反思的高度,从而使其散文的“在场性”不再仅仅是一种美学风格或写作姿态,更成为一种沉重的伦理承担与迫切的价值呼唤,是“文以在场”在生态书写上的显现。

在场主义的核心行动路径是“介入”,而“介入”往往始于“批判”。这种批判不是情绪化的牢骚或道德化的指责,而是建立在坚实认知基础上的理性审视与价值判断,是“去蔽”的直接体现。杨文丰生态散文的批判力度,由科学理性支撑,因而既能切入具体生态事件的肌理,又能直指背后深层的文化观念与文明痼疾。杨文丰的批判首先指向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引发的具体生态灾难。在《“清道夫”黑洞》中,他对入侵物种“清道夫鱼”(学名多辐翼甲鲶)的生态危害进行了翔实的生物学分析,但其笔锋所指绝非鱼类本身。他犀利地揭示出这场生态灾难的根源,批判人类出于猎奇心理与商业利益的“随意引入”与“盲目放生”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正是人类将自身欲望凌驾于生态系统规律之上的傲慢行为,导致了本土水生态的崩溃。这种批判跳出了就事论事的生态学报道,上升为对隐匿在现代性体系中的人类控制欲与功利主义逻辑的伦理拷问。同样,《雾霾批判书》一文对雾霾成因的气象学、化学剖析,最终归结为对粗放的发展模式、扭曲的能源消费结构与滞后的社会管理的系统性批判。科学视角让他精准地诊断了“病征”,而伦理担当则驱使他去追问“病因”——那种牺牲环境换取短期利益的发展观与生活模式。这是“介入当下”最直接的回应,一种绝不回避,也不美化,而是以笔代刀地解剖时代最严峻病灶的良知与立场。杨文丰散文更具哲学深度的批判,则指向被文化塑

造、巩固的病态生态关系与扭曲的审美伦理。这类批判突出而集中地体现在《人鱼》一文中。他将国人赏玩了数百年的金鱼还原为其本来面目——那不过是一条被人类通过长期囚禁与选育而刻意制造出的“畸形”的鲫鱼。他痛切地指出,金鱼是“被强行嵌入人的病态思想,被按照人的畸形审美观塑形”的“人之扭曲意志的形象化身”。^②这一论断的伦理力量是沉重的,这一剖析的文学病理学意义是残酷的。这不仅仅是在批判一种赏玩行为,更是在揭露一种深植于文化心理中的、将自然物按照人类狭隘甚至畸形的趣味进行“改造”与“奴役”的伦理模式。杨文丰将其批判的矛头,从具体的生态破坏行为,延伸至整个支配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病态文化心理与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这种批判,因结合了确凿的科学事实与锐利的文化洞察,而具备了“去蔽”的深刻力量,它揭去了笼罩在“风雅”传统上的温情面纱,露出了其内在的控制、扭曲与反自然本质。真正的伦理担当不止于批判,更在于建设性的价值探寻与意义“发现”。在场主义强调“发现性”,并指出“发现的终极目标是真相,或本真;发现的过程,就是求真的过程”^③。正如杨文丰在破除以人类为中心的错误伦理后,致力于建构一种全新的、符合生态本真的伦理框架。其核心便是由科学系统思维孕育而生的生态整体主义,以及由此深化而来的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态”)平衡互动的深刻洞察,这体现了他超越个人经验、追寻普遍真理的“精神性”追求。

不仅如此,杨文丰还化用了生态学领域的“生态体”概念,将其引入生态散文创作,赋予其文学化的审美内涵,并成为他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结晶。在《榕树寓言》中,他将独木成林的榕树及其周边所有生命与非生命环境视为一个互相影响、制约且趋向相对动态平衡的独特生态体。这不仅是生态学知识的文学转化,更是

①③ 周闻道:《在场精神的流变及其当下意义——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在场”》,《东吴学术》2018年第3期。

② 杨文丰:《人鱼》,《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4年第1期。

一种伦理立场的宣示:在这个“生态体”中,人类并非主宰,而是普通一员;伦理关怀的范围,必须从人与人之间,扩展到整个生命共同体。他倡导的“地球村意识”,正是这一思想在全球尺度上的延伸。这与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一脉相承,但更具东方式的系统思维与诗意表达。杨文丰的伦理建构,因此跳出了对单一物种或局部环境的怜惜,升华为对地球生命支持系统整体健康与可持续性的终极关怀。这种从全局出发、强调相互依存关系的整体观,本身就是一种重大的伦理“发现”,它为在生态危机时代重建伦理坐标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更具有现实介入力量的,是杨文丰对“三态平衡”关系的强调。他明确指出:“大生态散文,则是须深入探讨及艺术地表现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态’的关系及问题,强调人的谦卑与担当,崇尚‘天人和美’,已然进入了哲学境地的美学散文。”^①这一见解将生态问题从一个单纯的环境问题,还原为一个复杂的,交织着自然、社会与精神维度的综合性文明危机。在他的创作中,这种“三态”互动的视角贯穿始终。《雾霾批判书》不仅写自然气象条件(自然生态),更批判发展模式与能源结构(社会生态),也反思现代人追求便利而无视代价的价值观(精神生态)。《海殇后的沉思》从印度洋海啸(自然生态)出发,反思人类在自然面前的狂妄(精神生态),并审视全球灾害应对机制的缺陷(社会生态)。这种将自然、社会、精神三者视为一个动态整体来加以伦理考察的重要“发现”,极大地增强了其散文的思想厚度与现实介入力量,是在场主义“精神性”与“发现性”的显著表达。

杨文丰的伦理探索并未止步于对旧伦理的批判与新框架的勾勒,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具有实践导向与终极关怀的“新敬畏”伦理与“生态人”理想,为其整个伦理大厦树立了价值灯塔,也为其在场书写找到了精神归宿。杨文丰富有创见地区分了“旧敬畏”与“新敬畏”。旧敬畏源于对自然威力的无知与恐惧,带有蒙昧的迷信色彩;而“新敬畏”则是基于科学认知的、理性且主动的敬畏。在《海殇后的沉思》中,他提出,人类应对大自然怀抱一种“父性”与“母

性”的双重体认。他进而描绘了“子宫式生态圣殿”的理想图景:人类如同胎儿在母体中,与自然保持一种既依赖又和谐的原初关联,其中蕴含着“孕育、互赖、安全、敬畏、感恩和孝敬自然(母亲)等诸多内涵”^②。这种“新敬畏”伦理,既摒弃了征服自然的狂妄,也超越了浪漫怀旧的原始主义。它要求人类在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清醒地认知自身能力的边界,谦卑地承担起对生态系统的看护责任。这是一种融合了理性、情感与责任感的成熟伦理,为生态行为提供了内在的情感动力与道德律令。

杨文丰的伦理思考由此指向了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本变革,即呼唤从“异化人”向“生态人”的转型,断定“生态人”才是“生态使命的承担者”,是“唯一能够跨入地球村最高层文明——生态文明门槛的人”。^③这一论断体现了在场主义所强调的“精神性”写作的极致。它不仅批判现实,更致力于建构一种超越当下异化状态、指向未来文明形态的理想主体。他笔下的“生态人”,是一个具备了生态整体认知、坚守“新敬畏”伦理、在生活方式与精神世界上都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主体。对“生态人”的呼唤,本质上是对被技术理性与消费欲望所遮蔽的“本真”存在方式的艰难“去蔽”与积极“敞亮”,是在场写作在价值维度上的最终目的。在最新长篇散文《生态客家围》中,杨文丰将客家围的营造智慧,归纳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新敬畏”伦理。他指出客家围的形制是“以道家生态智慧为里”,其选址、布局、营建,无不体现“道法自然”“柔韧不争”的哲学要义,是“人对自然的谦卑、顺应而非居高临下地征服”。^④这种敬畏,并非出于无知的被动恐惧,而是主动将自然规律内化为建筑法则的生活伦理。他点明了全文的核心象征——“生态界围”^⑤。它意味着人

① 龙其林、杨文丰:《散文要有容量——对谈生态作家杨文丰》,《博览群书》2021年第4期。

② 杨文丰:《走进子宫式生态圣殿》,《自然书》,第24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③ 杨文丰:《夕阳笼罩的珊瑚——自然笔记》,《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3年第2期。

④⑤ 杨文丰:《生态客家围》,《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6年第1期。

类必须清醒地为自己对自然的动作设界,正如客家围为族人提供庇护的同时划定行动的范围一样。文末,杨文丰更将“客家人”的身份象征进行哲学泛化,指出在浩瀚宇宙和地球生命史中,“谁都是‘客’居地球村之‘家’的‘人’”,因此“我们都是‘客家人’”!^①这样,“生态界围”的伦理就从对一个特定民居的思考,升华为对人类整体生存境遇的终极关怀。他不断呼唤的“生态人”,正是这种认识到自身永恒“客居”身份后能自觉构筑并敬畏“生态界围”、懂得“科学而诗意地栖居”的文明主体。

杨文丰生态散文的伦理担当,构成了其在场书写的价值核心与精神顶峰。它凭借牢靠的科学认知,以深刻的诗性表达层层递进地铺开了一幅从现实批判到伦理建构、从生态关怀到文明反思的思想图景。在这一图景中,批判精神实现了“介入性”与“去蔽”的在场使命;生态整体主义与“三态平衡”观彰显了“精神性”与“发现性”的在场深度;“新敬畏”伦理与“生态人”理想,则指向了“本真”存在的终极价值,实现了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在场”的精神跃迁。杨文丰的生态散文牢牢锚定了其时代价值,尝试塑造一种直面灵魂、审视文明、烛照未来的生态伦理,是对“时代呼唤文学在场”的有力回应。还应看到,杨文丰的生态伦理书写并未停留于简单的道德判决,而是始终直面生态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与伦理性。《榕树寓言》中榕树的“独木成林”既是共生的典范,也是绞杀的现场;《冬虫夏草》中科学认知破除了迷信,却也加速了掠夺性开采;《人鱼》中金鱼的“美”恰恰是其“病”,人类的审美趣味导致了生命的扭曲;《雾霾批判书》中发展是生存所需,雾霾却是发展之痛。这些相互缠绕的生态悖论,并非杨文丰思想的矛盾,恰恰是其伦理思考深刻性的体现——他拒绝将复杂的生态问题简化为非此即彼的道德二元对立,而是将悖论本身和盘托出,让读者在张力中抵达对生态本真的更深觉知。

通过对杨文丰生态散文的在场主义审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科学、诗性与伦理三维共振的独特文学世界。这一世界不是静态的景观陈列,而是一个以“介入”为引擎、以“去蔽—敞亮—本真”为路径的动态精神场域。杨文丰的写作,以其鲜明的理性精神、深邃的审美转换与炽热的伦理担当,不仅践行了在场主义的核心主张,更将中国生态散文从自然书写的层面,有力提升至存在之思与文明批判的高度。

【本文系海德堡大学“从全球视角建构世界”研究奖金“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中的社会环境与人民生活”(2304578)、上海交通大学2024年度文科创新团队培育计划“社会转型关键词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WKCX06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薛平,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影视文学、生态文学;龙其林,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德国海德堡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访问教授,《文治春秋》编辑部主任,主要研究方向:转型期中国文化与文学,主要著作有学术专著《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自然的诗学: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新论》《大众狂欢: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透析》,随笔集《拒绝在沉默中遗忘》《在大众话语与专业话语之间》等,曾获中国文联第七届啄木鸟杯文艺评论大赛优秀作品、广东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湖南省第十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入选“广东特支计划”青年文化英才、上海市东方英才计划青年项目。

① 杨文丰:《生态客家围》,《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6年第1期。